

#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 本期要目 ——

- ◎ 2001-2010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评论
- ◎ 1391-2006年龙感湖—太白湖流域的人口时间顺序及其湖泊沉积响应
- ◎ 论康熙朝北京内城旗人的外迁及其影响
- ◎ 秦末汉初北部边界考略
- ◎ 论清代东北地区的厅
- ◎ 近世浙江丧葬习俗的区域特征及地域差异
- ◎ 明清以来晋南山麓平原地带的水利与社会  
—— 基于龙祠周边的考察
- ◎ 「源流派分」与「河网密切」  
—— 中国古地图中江南水系的两种绘法
- ◎ 台北故宫藏雍正《豫东黄河全图》研究

2011 3

## 目 录

- 2001- 2010 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评论 …… 召集人:华林甫 王社教(5)
- 十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的进展 …………… 王社教 冯 颢(5)
- 十年来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评论 …………… 丁 超(10)
- 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十年:总结与展望 …………… 杨煜达(17)
- 十年来中国历史地理文献研究的主要成就 …………… 华林甫(24)
- 十年来中国的历史地图研究 …………… 潘 晟(33)
- 十年来学界学术组织与学术力量评价 …………… 侯甬坚(37)
- 
- 1391- 2006 年龙感湖- 太白湖流域的人口时间序列及其湖泊沉积响应 …… 邹 怡(41)
- 论康熙朝北京内城旗人的外迁及其影响 …………… 赵寰熹(60)
- 
- 秦末汉初北部边界考略 …………… 赵志强(68)
- 论清代东北地区的厅 …………… 任玉雪(81)

中文核心期刊  
5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5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6 来源期刊  
5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6 来源期刊  
5 中国期刊网 6 全文收录期刊  
5 中国学术期刊 6 (光盘版) 全文收录期刊

---

近世浙江丧葬习俗的区域特征及地域差异 ..... 朱海滨 (92)

明清以来晋南山麓平原地带的水利与社会

))) 基于龙祠周边的考察 ..... 周 亚 (104)

/源流派分0与/河网密切0

))) 中国古地图中江南水系的两种绘法 ..... 丁 一 (115)

台北故宫藏雍正5豫东黄河全图6研究 ..... 席会东 (126)

古代/衡山0地望与5禹贡6荆州范围综说 ..... 陈立柱 纪丹阳 (136)

5中国历史地图集6十六国部分献疑 ..... 魏俊杰 (147)

清代化平川厅厅治溯源研究 ..... 李新贵 王亚勇 (153)

# 补 白 #

明代赤水河上已有桥 ..... 李大海 (160)

# 本刊启事 #

欢迎投寄外国历史地理研究专题论文 ..... (59)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季刊)

ZHONGGUO LISHI DILI LUNCONG

2011年第26卷第3辑(总第100辑)

Competent Authorities: National Educational Ministry

Sponsor: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Editor: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Chief Editor: Hou Yongjian

Publisher: Center for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orthwest China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Date: 2011-7-10

Tel: 029-85303934

Fax: 029-85308547

E-mail: zglsdllc@snnu.edu.cn

Printer: The Second Printer House of Xi'an Jiao Tong University

Overseases Distributor: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oration  
(P.O.Box 399, Beijing, 100044, China)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

编辑: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编辑部  
(陕西师范大学校内, 710062)

主 编: 侯甬坚

出 版: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  
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 2011年7月10日

电 话: 029-85303934

传 真: 029-85308547

电子信箱: zglsdllc@snnu.edu.cn

印 刷: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印刷厂

国内发行: 本刊编辑部发行组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100044)

ISSN 1001-5205



9 771001 520002

刊号: ISSN 1001-5205  
CN 61-1027/K

国外代号: Q1126 定价: 20.00元

# 台北故宫藏雍正《豫东黄河全图》研究

席会东

(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 陕西西安, 710069)

**[摘要]** 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 黄河河患中心从江南段向其上游的河南段推移, 康熙末年、雍正初年的几任河臣均把治河重点放在河南段。河患中心的转移和治河重心的变化推动了雍正年间河政管理制度的改革, 实现了江南黄河、豫东(河南、山东)黄河的分治。雍正二年至八年(1724-1730年)间, 先后担任副总河和河东河道总督的嵇曾筠在河南推行以开挖引河、裁弯取直为主要方式的治河方略, 先后绘制、呈奏过多幅类型多样的豫东黄河图,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豫东黄河全图》就可能是其中仅存的一幅。绘成于雍正六年(1728年)左右的《豫东黄河全图》描绘了雍正四年至六年(1726-1728年)间河南、山东段黄河的河势及两岸险工、堤防埝坝情形, 反映了雍正年间河患中心转移、河道总督分治、嵇曾筠治理河南黄河的史实以及雍正朝的黄河图绘制机制, 在清代河政史、水利史和地图史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关键词]** 《豫东黄河全图》 嵇曾筠 河道总督 河政

**[中图分类号]** K9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205(2011)03-0126-10

**[收稿日期]** 2011-03-2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地图调查、整理与研究”(06JJ0770002)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席会东(1981-), 男, 河南巩义人, 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讲师, 历史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中文古地图、城市历史地理、中欧器物交流史。

清康熙中后期以来, 经过靳辅、张鹏翮等几任河道总督的悉心治理, 南河黄运堤工告成, 实现了江南的黄河安澜、漕运畅通。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 黄河河患中心从江南清口和下河地区向上游的河南、山东段推移<sup>①</sup>。康雍之际, 河南段

重视, 是河政重心所在, 南河总督绘呈的“江南黄河图”也是清代黄河图最重要的类型。无论是清代的《天下輿图总摺》、《萝图荅萃》、《萝图荅萃续编》等图目, 还是清代档案、奏疏、水利专著中, 都有“江南黄河图”或“南河图”之称。雍乾黄河分治后, “江南黄河图”往往和“豫东黄河图”并称。江南分省时间, 史料记载纷乱, 学者意见多有不同, 主要有康熙六年说、乾隆二十五年说、乾嘉之际说等观点, 笔者赞同乾嘉之际说, 将有专文论述。关于江南分省问题的研究, 参见侯方杨:《清代十八省的形成本》,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8年第3期; 姜涛:《清代江南省分治问题——立足于〈清实录〉的考察》, 《清史研究》, 2009年第2期; 傅林祥:《江南、湖广、陕西分省过程与清初省制的变化》,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8年第2期; 公一兵:《江南分省考议》,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2年第1期; 王社教:《安徽称省时间与建省标志》,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1年第1期; 季士家:《江南分省考实》,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0年第2期。

<sup>①</sup>文中的江南是江南省的简称, 而“南河”则是由江南河道总督所管辖的“江南黄河”的简称, 这一称法贯穿整个清代的文献。雍正年间黄河决口等河患从江南河道总督所辖的江南省段向河东河道总督所辖的河南段转移, 也即从“江南黄河”(清人常简称为“南河”)向豫东黄河(清人简称为“东河”)转移。江南省分为江苏、安徽两省, 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清代輿图和水利文献中来看, 直到咸丰七年(1857年)清政府因黄河改道、江南已无河务而裁撤江南河道总督之前, 南河、东河两者相较, 江南河道总督所辖江南黄河大多数时间都更受清廷

黄河坐湾分汜严重, 武陟至开封段黄河堤工频繁决溃。黄河河患中心的变化也导致河臣治理重点的变化。康熙末年、雍正年间的河臣陈鹏年、齐苏勒、嵇曾筠等人均把黄河治理重点放在河南段。河患中心的转移和治河重心的变化又进一步推动了雍正年间河政管理制度的改革。雍正二年(1724年), 嵇曾筠任河南副总河, 专管河南河务, 又于雍正四年(1726年)兼管山东黄河, 雍正七年(1729年)分别设置江南河道总督和河南山东河道总督, 分别简称为“南河河道总督”和“河东河道总督”, 江南黄河、豫东黄河至此正式分治。

在先后担任副总河和河东河道总督期间, 嵇曾筠先后绘制呈奏过多幅类型多样的河南黄河图, 这些黄河图描绘了雍正年间河南段黄河的河势情形及两岸险工、堤防埽坝, 反映了雍正年间的河政运作机制和河图绘制机制, 具有文献史料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由于雍正朝的河患相对较轻, 而雍正帝的施政重心也在制度建设, 并未如康熙帝和乾隆帝一样重视治河并六次南巡、临视河工, 因此雍正朝的河图远没有康熙朝和乾隆朝多样和系统。时至今日, 仍然留存的雍正朝河图极为罕见。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有绢本彩绘的“豫东黄河全图”长卷一幅, 经考证此图即是雍正六年(1728年)前后副总河嵇曾筠绘制呈奏的, 对研究雍正朝的河政与河图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因此, 本文在考订台北故宫藏图源流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究雍正朝河南河图的绘制机制,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雍正朝的河政运作机制。

## 一 台北故宫藏《豫东黄河全图》之源流与内容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豫东黄河全图》长卷一幅<sup>①</sup>, 绢本彩绘, 纵横 37.5 × 390 厘米, 未注撰者和绘制年代。王庸 1932 年编订《国立北平图书馆特藏新购舆图目录》著录此图为: “黄河图, 自潼关以下至山东曹县、江南碭山, 清绘绢本, 著色, 一长卷。”<sup>②</sup> 可知, 此图系 1929 年至 1931 年间国立北平图书馆舆图部购入之图, 于 1948 年底运至台湾。1985 年编订《“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将此图著录为“黄河图, 一卷,

清代绢本长卷, 37.5 × 390 公分”<sup>③</sup>。王庸及其后的著录者均采用通称, 将此图定名为“黄河图”, 失之笼统而不具有区分度和辨别度, 不能准确反映此图的内容特征, 根据其覆盖范围和清代舆图的命名通例, 此图应命名为《豫东黄河全图》<sup>④</sup>。首先, 从覆盖范围来看, 此图虽主要描绘河南全境黄河, 但也绘制了山东曹县境内的黄河, 涵盖了豫东二省黄河; 其次, 在管理制度上, 雍正四年(1726年)之后的山东黄运河道与河南黄河同属副总河或其后的河东河道总督管辖, 清代黄河图主要是由河道总督负责编绘的, 因此由河东河道总督统一管辖的豫东二省黄河往往作为统一的绘制单元; 再次, 清代舆图目录中乾隆年间几幅同样类型和覆盖范围的黄河图多著录为“豫东二省黄河图”、“豫东黄河全图”, 民国年间的图目基本继承此类图名, 当代学者也采用著录此类

①刘铮云编, 林天人撰:《治水如治天下——院藏河工档及河图》, (台北) 故宫博物院, 2002 年, 第 23-24 页。

②王庸:《国立北平图书馆特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附国立北平图书馆特藏新购舆图目录》, (北平) 国立北平图书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铅印本, 第 24 页。

③台湾“中央图书馆”编:《“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 (台北)“中央图书馆”, 1985 年, 第 342 页。

④绝大多数中国古地图中都不著明图题、绘制者和绘制年代, 因此确定图名、绘制和绘制年代是古地图研究的重点也是难点所在。就整个清代的黄河图而言, 清代题本、奏摺等文书档案以及水利专著中往往采用“黄河图”或是“河图”等的通称来指称此类舆图, 不涉及绘制者和绘制范围, 过于笼统, 不具有区分度, 也不能作为相关舆图的正式图名。为了更为准确的辨识区分相关舆图, 清代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乾隆年间编订的《萝图荟萃》和《萝图荟萃续编》中开始将舆图绘制内容范围等信息纳入图名。此后, 民国年间的学者王庸、当代地图学者李孝聪等人均致力于进一步明确界定相关舆图的图名。因此, 在清代档案、传世文献及舆图目录的基础上, 进一步确定相关舆图的准确图名是非常必要的。

舆图<sup>①</sup>。基于以上原因，笔者将此图定名为“豫东黄河全图”。

《豫东黄河全图》长卷以水平方向从右向左展开，全图将黄河的右岸（即南岸）画在图的上方（大致方位为上南下北，左东右西），西起黄河南岸河南、陕西交界的潼关、阌乡县，东至南岸河南虞城县与江南砀山县、北岸山东曹县与江南砀山县交界处，以传统形象画法描绘潼关、阌乡至砀山县间黄河情势及沿岸的支流、山脉、堤防、埽坝、渡口、城池等地理要素。图的前段描绘潼关至荥泽县段黄河在两岸山脉夹峙中奔流的情形，其中山脉绘制精细，山势苍莽；图的后段重点描绘孟津、济源至江南砀山段黄河及其沿岸支流堤防情形，新修堤防、闸坝均加粗绘制，黄河与支流交会处，黄河引河、支河，都在图中得到了突出反映。

由于台北故宫藏《豫东黄河全图》上未注作者与绘制年代，也没有收藏印玺与题记，需要通过对其图上内容尤其是水利工程的考释与解读，来判断出其绘制年代。

首先，从图上的水利工程来看，考城、仪封、封丘、荥泽等处的堤工已修筑，表明其绘制年代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靳辅大筑河南堤工之后；黄河南岸郑州蓝家庄南的大堤已建立，表明其绘制年代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后；黄河北岸祥符县韩罗湾处的回回寨月堤已经修筑，表明其绘制年代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祥符、陈留、兰阳三县会筑堤防之后；黄河北岸武陟沁黄交汇处的钉船帮大坝上下已增筑减水坝、秦家厂、北坝尾的“御坝”已经修筑，“敕建嘉应观”已绘出，表明其绘制年代在雍正元年（1723年）之后；武陟仓头口已开挖“新挑仓头口引河”、完成裁弯取直，表明其绘制年代在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之后；黄河北岸钉船帮、秦家厂一带，俱已淤成滩地，表明其绘制年代在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十八日之后<sup>②</sup>；黄河北岸祥符县雷家寺上首有支河三道，且支河未堵，青龙冈兜湾处并未开挖引河、裁弯取直，表明其绘制年代在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引河挑浚之前；仪封县三家庄埽坝受冲之处的迎水大坝尚未建立，而山东曹县芝麻庄埽坝上首的挑水坝已经建立，表明其反映的年代在雍正

六年左右；黄河北岸封丘县荆隆口尚未开挖引河、裁弯取直，表明图上反映的年代在雍正八年（1730年）之前。另外，温县北侧绘有“弘福堰”，未避乾隆帝“弘历”之讳，表明其绘制年代在乾隆元年（1736年）之前。

其次，从图中的政区建置来看：荥泽县城已因河决而从黄河南岸平地迁治任店山的高阜之上，在原城址处标出“荥泽旧县”，表明其绘制年代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之后。考城县仍属河南归德府，未迁址改隶卫辉府，表明图上反映的内容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之前。

综合来看，《豫东黄河全图》的绘制时间应该在雍正四年至雍正六年（1726—1728年）之间。雍正年间担任河道总督或副总河、承担河南黄河修治的河臣先后有齐苏勒和嵇曾筠两人，通过对两人生平事迹尤其是担任河督时所修工程的考订，就可以判定此图反映的是哪任河督的治河事迹，进而推断此图的绘制者。

<sup>①</sup>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编订的舆图房精华舆图目录《萝图荟萃》（[清]乾隆敕编：《萝图荟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内务府舆图房档案，汪前进编：《中国地图学史研究文献集成（民国期间）》，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年，第1879页）中著录有“豫东二省黄河图”，嘉庆年间编订的《国朝官史续编》（[清]庆桂编，左步青点校：《国朝官史续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019页）中的图目著录沿袭了《萝图荟萃》中此图的图名；乾隆六十年编订的图目《萝图荟萃续编》（[清]乾隆敕编：《萝图荟萃续编》，汪前进编：《中国地图学史研究文献集成（民国期间）》，第1883页）中著录有“豫东黄河全图”，故宫文献馆1936年编订的《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民国二十五年，第40—41页）中著录有“豫东二省黄河全图”、“豫东黄运两河情形全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绘制范围和主题相近的舆图，当代学者李孝聪也将此图著录命名为《豫东黄河全图》（李孝聪：《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54—155页）。对于乾隆年间的几幅“豫东黄河全图”，笔者另有专文研究，兹不赘述。

<sup>②</sup>[清]田文镜编：《河南通志》卷15《河防五·河防事宜附黄河图》，清雍正十三年刻本，第17—39页。

## 二 嵇曾筠治河与《豫东黄河全图》之绘制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之后,经过河道总督张鹏翮的悉心治理,江南黄运堤工告成,黄河安澜、漕运畅通,黄河河患中心向上游的河南段推移。康熙晚期,河南段黄河坐湾分叉,武陟以下堤工频繁决口。如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六月,黄河决兰阳雷家集、仪封洪邵湾及水驿、张家庄各堤;康熙六十年(1721年)八月,河决武陟詹家店、马营口、魏家口,主流北趋,注滑县、长垣、东明,夺运河至张秋,由五空桥入盐河归海,淤塞运河粮道,震惊朝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正月,马营口复决,灌张秋,奔注大清河。六月,沁水暴涨,冲塌秦家厂南北坝台及钉船帮大坝。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决中牟十里店、娄家庄,由刘家寨南入贾鲁河。七月,决梁家营、詹家店;九月,决郑州来童寨民堤,并冲决中牟杨桥官堤。二年(1724年)六月,决南岸仪封大寨、北岸兰阳板桥<sup>①</sup>。

康熙年间,武陟工段是河南黄河最险要的河段,武陟也因此成为河南黄河治理和河政运作的重要结点。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月,康熙帝第一次南巡时就曾视察过武陟黄河险工段。康熙末年,武陟马营口屡次决口,清廷和河臣连年堵筑,左副都御史牛钮、张鹏翮、陈鹏年等人都曾受命参与工程。康熙六十年(1721年)八月,河决武陟马营口,朝廷重臣(廷臣)、河臣与地方督抚(疆臣)云集武陟,共议堵口,时任河道总督赵世显等人议定在李先锋庄筑坝。康熙帝派钦差左副都御史牛钮、侍讲齐苏勒、员外郎马泰赴武陟,传达了康熙帝的旨意:在钉船帮支河口建拦河坝,挑水南行后再堵决口。牛钮来赴工之前,康熙帝向其面授机宜,指出武陟堵口最为紧要,并亲自绘制了马营口堵口筑堤形势图,就图向牛钮交代筑坝、开挖引河等事宜。牛钮曾长期管理北运河,谙熟河务。按照康熙帝的指示,在河南巡抚杨宗义组织物料的配合以及尚书张鹏翮和陈鹏年等人的通力协助下,牛钮等人一举将钉船帮大坝抢修成功,马营决口顺利堵复。在勘察决口现场后,陈鹏年提出了开凿引河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康熙帝的认同和赞赏。但时任

河督赵世显却议而不决、未及时备料,康熙帝当即罢免赵世显,命陈鹏年代理河道总督。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正月,马营口凌汛再次决口。牛钮和杨宗义在钉船帮大坝的下首,组织修建新的秦家厂大坝。同时,陈鹏年在黄河南岸的王家沟主持开挖引河。引河放水后,马营堤防得到了保障。但进入伏汛后,黄、沁河并涨,秦家厂大坝四堵四决。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堵口成功后,陈鹏年积劳成疾,卒于堵口工次<sup>②</sup>。雍正帝称陈鹏年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臣”<sup>③</sup>,下旨予以褒奖。

雍正年间,对河南黄河的堤防修治与决口堵塞贡献最大的是齐苏勒、嵇曾筠,而两人在去世后,都与明代的宋礼、刘天和以及清代的林则徐等几位对河南黄河治理做出贡献的河臣一起,被供奉于河南武陟雍正帝“敕建嘉应观”西大殿即治河功臣殿之中。

齐苏勒字笃之,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人。康熙年间任内务府主事,后授永定河分司。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齐苏勒扈从康熙帝南巡阅河,至淮安时奉命在烟墩、九里冈、龙窝等黄河险要处修筑挑水埽坝,后又奉命监修河南武陟决口堤工,并上疏建言在沁河堤头至荥泽的大堤外另筑遥堤,使河水归一,刷深河道。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雍正帝即位,齐苏勒任山东按察使,兼理运河,在河南筹办黄河堤工。雍正元年(1723年),他任河道总督,上疏提出治河重在预防,订立章程整饬河员,亲自遍查黄运两河,测量堤形高低宽窄、水势深浅缓急,兴利除弊。阳武、祥符、商丘三县黄河北岸有三条支流,南岸青佛寺有一条支流,逼近堤根,威胁大堤安全。齐苏勒率人筑坝堵御支河,并接筑子堤和隔堤。在治理河南黄河之外,他还加筑清口两岸大坝,束高清水刷黄,命人在黄涨季节用混江龙、铁篦子驾舟疏濬,防止沙停淤积。另修治山东诸湖,调节运河水位,保持漕运畅通。雍正三年(1725年),齐苏勒与河南总督田文镜一起查勘

①[清]田文镜编:《河南通志》卷15《河防五·河防事宜附黄河图》,第26-30页。

②[清]田文镜编:《河南通志》卷15《河防五·河防事宜附黄河图》,第28-31页。

③《清史稿》卷277《陈鹏年传》,第10095页。



副总河嵇曾筠上奏开濬的祥符县回回寨引河。雍正五年(1727年),他上疏建言将黄河堤岸改为斜坡,密植柳树。雍正六年(1728年),他与嵇曾筠会勘雷家寺支河。雍正七年(1729年)春,齐苏勒辞世,雍正帝命人厚葬,并评价他为人“清慎勤”。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命人将齐苏勒与靳辅一同入祀京师贤良祠。齐苏勒是雍正初年最著名的河臣,经过他的精心治理,黄河自碭山至海口,运河自邳州至江口,纵横绵亘三千余里的江南黄运河工日益完整<sup>①</sup>。

雍正年间对河南黄河治理用力最勤、功绩最大的是嵇曾筠。嵇曾筠,字松友,江南长洲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雍正元年(1723年),他署理河南巡抚,后迁兵部侍郎,奉命督筑河南中牟县刘家庄、十里店诸地的黄河决口。雍正二年(1724年)春,黄、沁并涨,漫溢洮期营、秦家厂、马营口等处。嵇曾筠沿流审视,发现黄河北岸沙滩堆积,逼水南趋至仓头口,绕广武山根,河道弯曲;官庄峪处又有山嘴外伸,河溜由西南直注东北,致使秦家厂等处顶冲受险,导致决溢泛滥。于是他上折请在仓头口对面的横滩开凿引河,使水势由西北而东南,避免大溜激射东北,并培筑钉船帮大坝,增筑减水坝,缓解秦家厂险情。他又与齐苏勒会奏培筑河南黄河两岸堤防,北岸起茌泽至山东曹县;南岸起茌泽至江南碭山。两折所奏均经清廷议准实行。雍正二年(1724年),嵇曾筠授副总河,驻武陟,专管河南黄河。他上疏建言在郑州石家桥、中牟拉牌寨、穆家楼、祥符珠水、牛赵等迎溜处设埽护岸,并在郑州、中牟埽湾处建矶嘴挑水坝;还建言于祥符回回寨挑濬引河、导水直行。这些建言都得到了清廷的采纳和实施。雍正四年(1726年),他以卫河水盛而奏筑汲、汤阴、内黄、大名等县草坝,培筑郑州薛家集等处埽坝。雍正五年(1727年),他奉命兼管山东黄河堤工,五年五月奏筑兰阳县管、梁、蔡、耿四水口月堤,祥符南岸李盘寨、程家寨月堤。六年,他上疏建言在仪封雷家寺开引河,寻擢兵部尚书,调吏部,仍管副总河事。奏请培筑兰阳耿家寨北堤,并下埽签椿筑坝。雍正七年(1729年),授河南山东河道总督,疏请开荆隆口引河。八年,嵇曾筠署理江南河道总督,专门负责江南

黄河治理,而不再经管河南黄河河务<sup>②</sup>。

在治理河南黄河期间,嵇曾筠曾屡次绘呈河图,向雍正帝和清廷汇报河务,陈述修治方略。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张鹏翮奉旨到武陟,会同齐苏勒、嵇曾筠和河南巡抚石文焯,排除了武陟堤防险情,全面筹划武陟堤防体系。张鹏翮等人奏请将秦家厂大坝北尾堤接至遥堤并将帮遥堤,雍正帝于元年(1723年)八月十四日所发上谕中云:

圣祖指示钉船帮挑水坝,既应保固,即当从坝尾接至遥堤。若从秦家厂北坝尾接至遥堤,恐其兜水。其秦家厂月堤,与从中填实工价,应行估计之处,着派一员前往,与齐苏勒、嵇曾筠、石文焯议奏图本一并赏去。<sup>③</sup>

雍正帝在谕令中指出张鹏翮、嵇曾筠等人的计划遗漏了钉船帮大坝,称“第一要紧者,此处工程也”。同时,雍正帝谕令中还命人将齐苏勒、嵇曾筠、石文焯等人的奏摺及河图作为重要资料一并带至武陟,以便讨论治河之策。嵇曾筠奉旨修改了堤防建设计划,并在奏摺中称雍正帝指示重修的钉船帮大坝为“御坝”。钉船帮御坝重修之后,嵇曾筠在钉船帮大坝、新建挑水坝和格堤的结合处树立“御坝碑”,当地统称这些堤坝为“御坝”。其后,雍正帝还命河臣建诸河龙王庙,赐名“敕建嘉应观”并撰写“御制武陟嘉应观碑文”。当年秋汛后至雍正二年(1724年)春汛前,齐苏勒、嵇曾筠等人先后在武陟修建十余项堤防工程,武陟黄河堤防体系由此趋于完善。台北故宫藏《豫东黄河全图》已绘出钉船帮“御坝”和“敕建嘉应观”,表明其绘制年代在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之后。

雍正二年(1724年)七月二十二日嵇曾筠上奏“钦奉上谕事奏报引河开放日期水务”折,陈述钉船帮仓头口引河情形,折文略云:

①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13《齐苏勒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48-952页。

②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16《嵇曾筠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194-1200页。

③[清]世宗雍正敕编:《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10,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4册,第103页。[清]田文镜编、雍正十三年刻《河南通志》卷1所载略同。

钉船帮御坝尾接筑格堤，加镶护埽，仰赖我皇上指示周详，遵循修建，是以沁水长发，得资捍御，不致溢注马营一带。再仓头口对岸引河，荷蒙谕允，发帑挑濬，已于本年五月十六日竣工，经臣具折奏报，嗣于五月二十五日，乘水长风，便将河头开放，水势由西北顺达东南。……今数十日，河底深通，全无壅滞，商船络绎，大溜遄行，循广武山根，顺流东注，其北河口渐长淤滩，秦家厂一带湍激势减。所有引河开放日期，现在水势情形，谨缮折奏闻，并绘图贴说，恭呈御览。<sup>①</sup>

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十八日，嵇曾筠奉雍正上谕进一步回奏引河情形：

其仓头口引河，业经冲刷深通，水势顺流，自西东注；而北岸钉船帮、秦家厂一带，俱已淤成滩地，播种麦苗。……谨奏引河深通，秦家厂一带淤成滩地，各情形诚堪欣幸。<sup>②</sup>

根据两折文中所载，嵇曾筠于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二日随折进呈的黄河图主要描绘武陟仓头口引河情形，根据内容和清代舆图命名通例，应命名为“武陟仓头口引河图”。此图是否存世目前难以确定，但两折文中所陈奏的仓头口引河、钉船帮、秦家厂一带的滩地情形，都在台北故宫藏《豫东黄河全图》中得到了表现，表明《豫东黄河全图》的绘制在雍正二年（1724年）之后。

雍正四年（1726年）四月十五日，嵇曾筠再次绘图进呈雍正帝御览<sup>③</sup>。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十四日，雍正帝将内阁学士何国宗奉命阅河后所上的奏摺与河南总督田文镜、副总河嵇曾筠所上的奏摺及相关河图发给九卿会议讨论，并令其依照田文镜、嵇曾筠所议实行<sup>④</sup>。可见，雍正四年（1726年），嵇曾筠与奏摺一并上呈的河图经过了雍正帝的御览和九卿等重臣的研讨，在雍正朝的河务决策中得到了充分运用。根据雍正年间的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的藏图目录——《天下舆图总摺》记载：“雍正四年三月初五日，太監王章传旨交来《黄河图》一张、《新黄河图》二张、《黄河图》一张。”<sup>⑤</sup>《天下舆图总摺》中所载黄河图的内容如何，是否与上述嵇曾筠绘呈舆图有关系，因史料阙如，难以断言。可以肯定

的是，雍正四年间，嵇曾筠、齐苏勒等河臣曾经呈奏过黄河图，并由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存贮。

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二十二日，河南副总河兼管山东黄河堤工嵇曾筠随折绘呈《黄沁安澜图》，向雍正帝汇报河南黄沁两河的河势与河务，雍正帝详阅河图，并在图内谕示嵇曾筠要在图内黄河坐湾分汊之处开挑引河、裁弯取直，化解险情。嵇曾筠接旨后，对河南黄河兜湾分汊处进行详细考察，并于雍正四年（1726年）十一月十五日进呈“奏报查勘引河折”，将开凿引河的情势利弊详细奏陈，其折文略云：

雍正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臣具折恭进《黄沁安澜图》，本月二十三日奏事张文彬传臣贵折家人，展图指示，传皇上圣旨：“河图上这湾子，该开道引河，南岸司家道口等处，就不受害了。迤下这湾，亦应开河。若别处有形势相类的，都应相机开河。传谕到臣，钦此钦遵。”<sup>⑥</sup>

嵇曾筠在奏摺中继续写道，他接到家人带回的雍正上谕和批示本河图后，就立即率领河员乘船相度形势，考察豫东两省黄河河患根源和兜湾之处。他发现“黄河形势，东西畅流，则势顺而安恬；南北斜冲，则势横而激荡”。黄河河身自广武山而下，引河深通，主流基本通畅。但祥符以下，河势多曲，每遇扫湾转溜之处，就形成南北斜冲之势，两岸险工深受其害。黄河南岸考城的司家道口等处，北岸仪封的三家庄，所受危害最重。自仪封北岸的赵家寨向西，河身坐湾回

①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摺》（第2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7年，第896页。

②[清]世宗雍正敕编：《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75之一《硃批嵇曾筠奏摺》，第33-34页，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89-490页。

③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摺》（第6辑），第748页。

④[清]世宗雍正敕编：《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4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4册，第411页。

⑤[清]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编：《天下舆图总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舆图房档案，北京大学李孝聪教授提供抄录件，特致谢忱。

⑥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摺》（第6辑），第884页。

环，直冲正南。自考城至缕水堤往北，河身又环向正东，扫逼勾家寨，淘作兜湾。每遇水涨之时，黄河下行不畅，则横流旁注，汕成支河，分道南侵，成为考城司家道口一带受病之源。河道自勾家寨斜趋西北，又折行东北，经河南三家庄、山东的芝麻庄等处，绕道向南，至王家楼往下，才斜流东注，坐湾屈曲，南北横冲是黄河北岸豫东两省险工受病的根源。

之后，嵇曾筠阐述了开挖引河、裁弯取直的实施方式和条件。他认为将南北两湾从中挑断，开引河引水直流，就可以改南北之形而成东西之势，对缓解两岸堤防压力大有裨益。但是开挑引河，必须是河头有吸川之形，河尾有建筑之势，才能成功；上下接挑之处，尤其需要上段河尾与下段河头，吐纳相应、呼吸相通，才能一气贯通。经过勘察，他发现仪封、考城两县的河滩都是平沙漫衍，并无西高东低之势，首尾也不能直接顺通。而且，河头接溜处离北岸较远，而离南堤较近，开挖引河虽能缓解北岸之险，但却增加南岸险情，难以两全。因此，当下只有督率河员，加强堤防守护，防止来年汛水。倘如遇到河形迁改，条件成熟，就即时具奏开挑引河。

根据实地考察，嵇曾筠发现，除了雍正帝在图中指示裁弯取直的仪封、考城处兜湾河段外，祥符县南岸的程家寨、兰阳县南岸的四水口险工，也都应疏濬。祥符程家寨一带，黄河自柳园口向下，至军张楼以上，从北岸扫湾起势，由西北趋东南，逼近堤根，很是险要。如在北岸开挖引河以分水势，使河形取直，南岸就可避免险情。兰阳四水口一带，黄河自祥符、陈留漫滩汇流而下，将水口北面的支河冲刷深广，水势强悍；加上南崖坍塌，仅恃单堤捍御，极其险峻。如能从上流欧家潭扫湾处至铜瓦厢开挖引河，从鲍家寺北岸至朱家庄接开引河，就可平抑四水口险情。但两处开挑引河的条件都还不成熟，只有先加意巩固兰阳四水口大堤并添建土埽工程。

基于以上情形，嵇曾筠认为当务之急仍是守护大堤，如全河形势有所改移，条件成熟，即因势利导，开挖引河，实现雍正帝的指示。他将查勘各工堤河情形，绘图贴说，与之前进呈的《黄沁安澜图》一起呈奏雍正帝御览。雍正帝览折后，对嵇曾筠并未一味迎合他开引河的指示、而

是据实陈奏的言行大加赞赏，勉励他坚守利国利民的良好用心，根据实情处理河工，早日解决黄河水患<sup>①</sup>。

通过嵇曾筠这份奏摺，可以了解雍正朝奏摺和嵇曾筠《黄沁安澜图》的运作流程和河政决策机制。嵇曾筠派家人至京师向雍正帝呈送奏摺和舆图，雍正帝御览披覆后，命奏事张文彬将朱批奏摺交给嵇曾筠家人，并就河图传达雍正旨意和指示。嵇曾筠接到家人带回的雍正朱批奏摺和上谕后，即按谕令进行考察，将所见情形和其中利害缮写成奏摺，并再度绘制河图，连同雍正帝批示过的《黄沁安澜图》一起上奏给雍正帝。

根据折文所载，嵇曾筠于雍正四年（1726年）十一月十五日随折进呈的黄河图主要描绘了豫东两省黄河险工及黄河兜湾与引河开凿情形，根据内容和清代舆图命名通例，应命名为“豫东黄河引河形势图”。折文中所陈奏的考城司家道口、仪封三家庄、祥符程家寨、兰阳四水口等处险工和兜湾形势，都在台北故宫藏《豫东黄河全图》中得到了重点描绘，表明《豫东黄河全图》的绘制在雍正四年（1726年）十一月之后。

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二十九日，嵇曾筠终于等到了开挑引河的时机，即刻上折向雍正帝奏报。《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75之2《硃批嵇曾筠奏摺》载其“奏为乘机因势开挑引河以固大堤仰祈睿鉴事”折云：

上年十月内臣恭进《黄沁安澜图》，仰蒙圣慈就图指示，将湾处挑直，堤工即可化险为平，谕臣查勘具奏。……今查得仪封县北岸雷家寺一工，向因大河自南岸青龙冈迤下，由西南扫湾起势，直注西北，致将雷家寺上首之滩，刷开支河一道，沿堤走溜，经宋家营、徐家塘、曲家楼等处，直至三家庄出口，五十余里腾波涌浪，势同奔马。每遇汛水泛涨，上下抢护救应不遑。……现今青龙冈迤下水势，滌洄纾折，将上湾淘作深

<sup>①</sup>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摺》（第6辑），第884—886页。又清世宗雍正敕编：《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75之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3册，第514—515页），第25—28页，录嵇曾筠奏摺原文及雍正帝朱批谕旨，摺文基本相同，而雍正帝的朱批谕旨已经剪裁润饰，尽去口语。

兜。与下湾相对，止隔四百一十丈。臣率领道厅汛员细加看验，上水河头已有吸川之形，下水河尾亦有建筑之势，亟宜乘机因势，开挖引河，导水东行。……谨缮折绘图，先行奏闻。<sup>①</sup>

在上引折文中，嵇曾筠详细陈述了仪封北岸雷家寺至三家庄建支河和青龙冈兜湾形势，奏请开挑引河，并绘制河图描绘相关情形，连同引河工程预算报请雍正帝御览批准。雍正帝令其与河道总督齐苏勒商议酌定相关事宜，并于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命齐苏勒赴河南会同嵇曾筠勘办河南雷家寺一带堵截支河、开挖引河事。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初八日，经过实地勘测后，齐苏勒上折回奏，黄河大溜在北岸雷家寺上游刷成三道支河，沿堤走溜至三家庄埽坝顶冲之处才归入正河，按照雍正帝在河图中的批示，拟在三家庄埽坝受冲之处添筑迎水大坝，并在山东曹县芝麻庄埽工上首添筑挑水大坝，使雷家寺上下游都有保护设施<sup>②</sup>。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二十七日，嵇曾筠也就雷家寺一带堵截支河、开挖引河事上折奏陈，除了再度陈述齐苏勒上折中所陈述的主张外，还向雍正帝汇报工程最新进度，奏说三家庄迎水坝及芝麻庄挑水坝均已修筑，而雷家寺引河也已经完成八分，指日可成<sup>③</sup>。

雷家寺引河于雍正六年（1728年）二、三月挑浚完工，于雍正六年（1728年）五月十二日河水盛涨时挑开放水。嵇曾筠于同年五月二十八日连上“恭报五月水势平稳折”、“恭报引河告成水势畅流折”、是年七月二十七日上“恭报七月水势平稳折”<sup>④</sup>等三折，又于六年（1728年）十月初二日上“奏报秋汛平稳折”<sup>⑤</sup>，向雍正帝奏报雷家寺引河挑浚后的仪封北岸黄河水势情形。台北故宫藏《豫东黄河全图》中并未绘出雷家寺青龙冈引河，可知其绘制年代在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工程完工之前。

此后，河东总督田文镜曾于雍正七年（1729年）九月二十九日随折绘呈的“铜瓦厢新开天然引河图”，向雍正帝汇报兰阳北岸铜瓦厢至朱家寨段自然裁弯取直形成新河道的情形<sup>⑥</sup>。嵇曾筠和协理河工事务徐湛恩于雍正八年（1730年）三月二十日随折绘呈“荆隆口引河图”，向雍正帝提出从黑堽口至柳园口开凿荆隆口引河的建设

议<sup>⑦</sup>。两份折文中所描述的引河工程在台北故宫藏图中都没有表现，而其随折之图也不可能是台北故宫藏《豫东黄河全图》，这进一步证明《豫东黄河全图》的绘制时间在雍正七年（1729年）之前。

嵇曾筠从雍正元年（1723年）督修河南险工到雍正二年（1724年）担任副总河，再到雍正七年（1729年）起担任东河河道总督期间，用八年时间悉心治理河南黄河，先后多次主持绘制呈奏黄河图，其中既有重点描绘仓头口、雷家寺和荆隆口等局部情形的“仓头口引河图”、“雷家寺引河图”和“荆隆口引河图”，又有全面描绘河南黄河情形的“黄沁安澜图”和“豫东黄河全图”。其中，“仓头口引河图”、“黄沁安澜图”属于工程完工之后绘制的河势情形图，而“雷家寺引河图”和“荆隆口引河图”则属于事前绘制的工程规划预算图。除了河臣嵇曾筠绘制的河图之外，时任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疆臣）也于雍正七年（1729年）绘制有“铜瓦厢天然引河图”，充分体现了雍正年间河图的多样性。这些黄河图反映了雍正年间的河南黄河情形，嵇曾筠以裁弯取直为主要手段的治河方略和雍正帝的治河意见，表现了雍正年间的河政运作和河务决策机制以及文书和信息传递机制。

①[清] 世宗雍正敕编：《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75之2，第25-28页，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3册，第531-533页。

②[清] 世宗雍正敕编：《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2下《硃批齐苏勒奏摺》，第24-26页，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6册，第120-121页。

③[清] 世宗雍正敕编：《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75之《硃批嵇曾筠奏摺》，第32-34页，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3册，第535-536页。

④[清] 世宗雍正敕编：《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75之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3册，第539-541页。

⑤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摺》（第11辑），第463-464页。

⑥[清] 世宗雍正敕编：《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26之18《朱批田文镜奏摺》，第36-38页，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1册，第545-546页。

⑦[清] 世宗雍正敕编：《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75之3，第33-36页，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3册，第564-565页。

### 三 雍正朝河政运作与《豫东黄河全图》

雍正年间，黄河河患中心从康熙年间河臣重点治理的江南清口和下河地区向上游的河南段推移，黄河河患中心的变化导致河臣治理重点的变化，而河患中心的转移和治河重心的变化又进一步推动了雍正朝河政管理制度的改革。雍正年间的陈鹏年、齐苏勒、嵇曾筠等几任河臣均把黄河治理重点放在河南段。与此同时，江南黄河仍然是治河保运的重点区域，河道总督仍驻跸淮安清江浦，往来奔波，多有不便。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任命嵇曾筠为河南副总河，驻武陟，专管河南河务，南河、东河开始分治。雍正四年（1726年），嵇曾筠又因山东河患加剧而移驻山东济宁，兼管原由山东巡抚经管的山东黄河堤工<sup>①</sup>。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改河道总督为江南河道总督，驻淮安清江浦，称南河河道总督，简称南河总督，习称其所管黄河为“南河”；复改副总河为河南山东河道总督，驻济宁，称河东河道总督，简称东河总督，习称其所管黄河为“东河”<sup>②</sup>。清廷分别设置江南河道总督和河东河道总督，分理江南（今苏皖两省）黄运河务（长江以南运河因行漕畅通基本无需人工修疏，因此不归河督管辖）和河南、山东黄运河务，形成淮安清江浦和山东济宁两个河政中心，南河和东河分治制度正式确立。雍正八年（1730年），清廷又增置直隶河道总督，驻天津，专管永定河和直隶境内运河，形成南河、东河、北河三督并置的格局<sup>③</sup>。黄河分段管理制度的确立和实行，标志着河政管理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河政管理体系日益完备。

在雍正朝的河南黄河治理和河政决策过程中，雍正帝与河臣、雍正帝与朝臣、朝臣与河臣、河臣与疆臣，围绕河图的绘制与呈奏、阅读与讨论，形成几重相互交织的决策圈。黄河图成为河臣、雍正帝、朝臣、疆臣之间沟通河务的桥梁和进行河政决策的重要依据。与此同时，随着雍正年间奏摺的普遍推行，河臣陈述河务、绘呈河图的主要方式也由康熙年间的题本改成了奏摺。河臣如河东河道总督嵇曾筠等通过实地考察和下级呈奏的资料来聘任僚属绘制河图，通过奏

摺和河图来陈述治河政见、汇报河务和核销河务开销；雍正帝通过河臣的奏摺来了解河务及河督治河进展，通过随折呈送的河图了解黄河情势和工程形态，通过与朝臣之间的廷议来进行河务决策，并通过在奏摺和所附河图中的批复向河督指授方略；朝臣如左副都御史牛钮、武英殿大学士张鹏翮、内阁学士何国宗等通过廷议来参与河务决策，通过授命勘河、督工、回京复命等形式来向河臣传达雍正帝谕令并直接了解和参与河务；沿河地方的督抚如河南巡抚石文焯、河东总督田文镜等疆臣通过佐理河臣治河、组织提供河工物料、绘呈奏摺河图等形式来直接参与河务。可以说，黄河图在雍正朝的河政运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台北故宫藏《豫东黄河全图》反映了雍正年间河患中心转移、河道总督分治、嵇曾筠治理河南黄河的史实以及雍正朝的舆图绘制机制，描绘了雍正四年至六年（1726—1728年）间河南段黄河的河势情形，突出表现了黄河中的支河、坐湾和裁弯取直的情形及两岸险工、堤防埽坝，体现了雍正年间以开挖引河、裁弯取直为主要手段的治河方略，反映了雍正年间的河政运作和河务决策机制以及文书运转机制，在清代河政史、水利史上都有重要意义。与康熙朝主要表现江南黄河情形和黄河全势的黄河图不同，台北故宫藏《豫东黄河全图》的覆盖范围主要集中于河南一省，开创了清代分段黄河图绘制的先河。另外，《豫东黄河全图》是仅存几幅雍正朝的河渠水利图之一，也是所知现存最早的描绘康熙年间河南一省黄河情势的绘本河渠图，在清代河渠水利图乃至地图史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sup>①</sup>《清世宗实录》卷50，雍正四年十一月庚子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54页。

<sup>②</sup>《清世宗实录》卷79，雍正七年三月辛亥条，第35页。

<sup>③</sup>光绪《清会典事例》卷23《吏部七·官制》，（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第293页。河南、山东黄河，在江南黄河之北，初称“北河”，后设直隶河道总督，称其所管为“北河”，河南山东黄河又改称“东河”，以示区别。

# Study on “Overall Map of the Yellow River in Henan and Shandong Province” Preserved in Taipei Palace Museum

Xi Huidong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Northwest History,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 years of the Kangxi Reign and years of the Yongzheng Reign, the flooding center of the Yellow River transferred from Jiangnan Province to Henan Province, which made the Watercourse Viceroy focus their governing center of the Yellow River on Henan Province. The shifts of the flooding center and the governing center of the Yellow River promoted the reform of the Watercourse-governing institutions and made the separate administr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in Henan Province and in Jiangnan Province, the Henan and Shandong Province during the Yongzheng Reign. From the 2th to 8th year of Yongzheng Reign (1724–1730), Ji Zengyun, who had occupied the Vice Watercourse Viceroy and the Hedong Watercourse Viceroy successively, carried out the watercourse-governing strategies which took the channel-digging and bend-cutting of the river as the main method. Ji Zengyun had painted and submitted several different types of map of the Yellow River in Henan Province, one of the maps exists and is preserved in the Rare Book and Document Department of the Taipei Palace Museum, and that is the long-scrolled colorful silk “Overall Map of the Yellow River in Henan and Shandong Province”. The “Overall Map of the Yellow River in Henan and Shandong Province”, painted in about the 6th year of Yongzheng Reign (1728), describes the situations of the watercourse and hydraulic projects of the Yellow River in Henan Province from the 4th to 6th year of Yongzheng Reign (1726–1728), tells the history of the shifts of the flooding center and the governing center of the Yellow River, reform of the Watercourse-governing institutions, the watercourse-governing strategies of Ji Zengyun and the mapping system of the hydraulic maps in the Yongzheng Reign, thus it takes irreplaceable place in the watercourse administrating history, the hydraulic history and the cartographic history of China.

**Key words:** *Overall Map of the Yellow River in Henan and Shandong Province*; Ji Zengyun; Watercourse Viceroy; Watercourse-governing Politics

---

(上接 125 页)

## The Local Perspective versus the National Perspective: Two Approaches to Portray the Water System of Jiangnan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artography

Ding Yi

(*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y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To begin with the genealogical analysis of those maps called Kangnido, two opposite cartographic approaches of rendering the river system in Yangtze Delta could be revealed. The first one can be counted as “the national perspective”, with which the river system in Jiangnan is outlined with distinguishedness from mainstreams and tributaries. The second one can be deemed as “the local perspective”, with which the river system is pictured as a fully connected network and the lands as segmented islands. The local perspective mainly expresses impressions about being surrounded by water, meanwhile it still manages to convey useful hydrological information for the map-viewers. In the end, as a result of the discussion ahead, a new angle in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artography, namely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is proposed.

**Key words:** Kangnido; the local perspective; the national perspective